

说银行是弱者，全国人民都笑了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日前对广州许霆案作出回应，他表示，银行系统出错绝对不能成为某个人盗窃犯罪的理由，希望银行业协会能在这样的事件中为银行说话。杨凯生表示，银行其实是弱者，并非是公众想象中的垄断机构，也希望行业协会能帮助澄清。

（《新京报》2月29日）

[青早一评]

“银行是弱者”一语惊天动地，引起舆论哗然，显然，这是一个让公众难以接受的自我“身份认同”。银行作为垄断经营的霸王习气由来已久，公众感同身受：如果银行是弱者，那么作为强者的储户显然不会为取点钱，站在柜台前一排起队来就是几十分钟；如果银行是弱者，那么它就不会屡屡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幌子，强行收取跨行查询费；如果银行是弱者，那么它就不会“嫌贫爱富”，比如广东东莞某银行对小储户设门槛，规定“低于2000元的汇款将不再受理”。

许霆案发生以后，可以看到在这起引起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中，许霆，这个平常并无劣迹、一时贪心取走了不属于自己的17.5万元而

↓“银行争当弱者 背后‘用心良苦’”

遭致无期徒刑的青年，无疑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而涉案银行则因为完全的免责而成为众矢之的。在公共舆论的漩涡中，银行业一直处于非常被动的处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银行是弱者”的话语表达，不过是银行在不利处境下的“胡言乱语”和一种危机公关方式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近年来争当弱者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现象，比如北大的阿忆教授拿着工资条哭穷，比如地产大佬任志强自称是当下的穷，比如大富豪严介和说富翁其实都是弱势群体等。现在，居然轮到银行跳出来说自己是弱者了。

显然，人人争当弱者的社会现实，绝对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要知道，弱者不是自己标榜和说出来的，弱者就应该有弱者的姿态、行动和风度。对于这种争当“弱者”背后的

青岛早报 3月1日 作者 石敬涛

“良苦用心”，我们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快报再评]

说这是银行在不利处境下的一种危机公关方式，大体不错。但请注意，许霆案相对方是广州商业银行，而非杨行长当家的中国工商银行；杨行长没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政府权威，他也只是一家之言。说争当“弱者”绝对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算是有理。不过，以柔克刚、示人以弱，是符合《道德经》的传统文化，杨行长有此一说也很正常。我倒认为，此说出现有两点令人欣喜。一是表明“弱者”在当今社会还是有人怜悯的且占舆论优势；二是杨行长的行业意识很强，唯恐“免死狐悲，物伤其类”，其通过“非政府组织”联合维权的精神与方式值得我们学习。

挤公交 挤出黑色幽默

↓“‘万元邀市长’将了‘有奖让座’一军” 中国保险报 2月29日 作者：童大煥

深圳一名市民乘公交车时连续等来了11辆车，都因车上过于拥挤拒载乘客。该市民大受打击，在网上发帖称愿出10000元请主管副市长坐公交车体验乘车平民之苦，希望以此引起市长对城市公交系统的关注。

（南方都市报 2月26日）

北京市决定每月22日为“让座日”，推出“让座爱心卡”，在公交车上让座的乘客，将通过司售人员获得卡片。到底年底时，获得卡片较多的乘客，将获得物质奖励。

（京华时报 2月22日）

[中保一评]

毫无疑问，“万元邀市长乘公交”是一个相当直接有力的民意表达，一夜之间有关它的信息和评论已经传遍全国。北京人“别再挤了，再挤就成相片了”的冷幽默，亦是北京公交的一个真实写照。

北京在公交优先上是下了不少力气的，每年40亿元补贴公交、10亿元补贴地铁，以支撑起目前全国最廉价的公交体系，这是一个大手笔。但公交廉价只是公交优先的一小步。曾任纽约市长的布隆伯格有一个被人称道的“喜好”，就是不坐专车，每天都坐地铁上下班。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作秀，但他自己表示，乘地铁既省钱，又可缓解市中心交通拥堵，还是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而且他可以了解交通部门的工作情况，化解市民对地铁安全的忧虑。

如果我们各个城市的市长和城市公交决策者每个月都能在高峰时段坐几次公交，就能深刻体会到公交优先的真正含义远不只是公交廉价，而在更重要的公交路权优先及舒适度和方便快捷等问题上。更多的公交车辆和车次，更舒适、快捷的公交服务才是公交优先的本质。我们不可能要求城市公共交通人人随时有座，不可能要求交管部门像打击长途客运超载一样打击公交超载，但要求高峰期超载率不超过30%，其他时段超载率不超过10%，不论从交通安全还是从公交舒适度考虑，都是必要的吧？

[快报再评]

深圳的“万元邀市长坐公交”与北京的“有奖让座”，都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前者表达了对市长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与群众打成一片”体察民情，解除民困的渴望，是对官员脱离民众的婉转批评；后者把乘客当幼儿园的小孩，用攒了卡片兑奖的方式诱导他们做好事让座。听起来都有些搞笑，但当事人却说他们是认真的。前者说万元赏金已准备好了；后者是政府部门的联合公告。无论如何，叫人笑不起来，要笑也是“含泪的笑”。看来，国人真是病得不轻呀。

政府给人民发红包一点不荒诞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27日上午向立法会提交2008/2009年度财政预算案。这是曾俊华就任财政司司长后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案。曾俊华表示，其财政政策的核心，是对社会有承担，化解人口老化的挑战，以及达致经济可持续发展。他希望通过预算案推出的多项措施，与市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新华网 2月27日）

[新快一评]

2月27日，香港政府公布2008-2009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按新的预算案，政府今年将少收入300亿，市民的钱包却鼓起来。而且，有别于内地有人批评上海某政协委员提议给全民发1000元红包，香港媒体认为，“一次性派糖，胜开长期饭票”，表达的就是对这种方案的赞同。

按惯例，香港政府只要取得超过预期2%的收入，就要给全民分红。而2007-2008年度的政府盈余居然高达预测的四倍半。现在的分红定案是，减免去年部分个人所得税，并且提高个人所得税扣缴基数，而且还包括了扩大的免税清单。事实上，不仅是免税和减少税收，这次香港政府还直接给民众“派糖”，尤其向弱势群体“派糖”。其中一些项目事实上类似于政协委员所说的分红。

一是，拨款43亿元向全港每家提

↓“香港直接给民众发红包的启示” 新快报 2月28日 作者 吴木銮

供1800元的电费补贴。二是，为低收入家庭代缴一个月公屋租金，开支约10亿元。这意味着低收入家庭今年有一个月的公屋租金不用交。三是，向每位领取高龄津贴的老人一次性发放3000元，政府还拨款6000万元增加日间老人护理名额、资助改善老人护理的质量。四是，为有需要的家庭和儿童提供额外支持，未来三年增拨4500万元加强日间孩子寄养服务，推广更有弹性的托儿服务；增拨4000万元，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人及有需要家庭的支持。五是，成立四个支持服务中心，为少数民族人士提供传译及语言课程等服务。六是，政府向撒玛利亚基金注资10亿元，向有经济困难的病人提供资助。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政府直接给老人一次性发3000元红包体现了政府的深思熟虑。如果一次性公布一个长期的“饭票”，一旦今后无法兑现，就会产生政府公信力危机。而现在是丰收年，一次多给老人补贴一些，至少让老人在通胀的岁月中生活得更

加体面一些。这是务实的执政行为。

联想起内地近期部分经济学家对上海政协委员提议的批评，相比于香港政府决策的快速和干脆，那些经济学家的确只是贯彻经济教条的小工匠。

[快报再评]

在上海市第十一届政协会上，政协委员刑普建议，国家财政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这样的提案超出了我们许多人的思维范围，觉得很惊奇，甚至被认为是搞笑、作秀及至搅局。但是，刑委员是认真负责的，有“海归”的见识和专业的背景。他在阐述自己主张时，举了新加坡人民直接从政府获得金钱、美国政府在经济衰退时多运用退税直接刺激经济等例子。现在这位在香港读博的吴先生又以香港为例振振有辞。他们的说法不一定会被政府采纳，但可以开阔我们的思路，“利为民所谋”的大方向总是不错的。

劳动者走到哪儿 社保就该跟到哪儿

每逢春节前后，最热闹的地方肯定是火车站，从南到北，各地站前广场上满是彻夜排队买票候车的队伍，人山人海，就在今年春节前，记者在深圳也拍到了一组彻夜排队的镜头，只不过，拍摄地点不是在火车站，而是在当地社保局的服务大厅，马上要回家过节了，这么多人跑到社保局排队排大队，到底为什么？退保。

（中央电视台 2月25日）

[都市报一评]

谁都想老来有依靠，退掉社保实为工作没有保障的无奈之举，且这一问题不光农民工有，全国除公务员等少数人外的劳动者都有。农民工退保，除了养老保险是带不走、挪不动的“地方粮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保不能有效对接外，就是缴费15年的跨度太长，更重要的还是农民工收入过低，使他们不得不首先顾及眼前的生存，无力支付将来养老保险的费用。

我国目前的各项社会保险在计算年限、缴费办法等方面，都是依据城镇正规就业情况而定的，对农民工这种特殊人群，应该说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在深圳，职工每月在工资中扣除8%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企业为该职工上缴10%，如果以一个月平均工资1000元的人为例，个人缴80元，企业缴100元，缴纳15年，总共才3.24万元，假定这个人60岁退休，

按深圳市养老保险金的现行计算办法，他每月有退休金398元。如果像去年那样物价上涨，15年后这398元钱不知道能不能买到一袋大米？

农民工退保潮的另一方面，就是地方政府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为农民工大开绿灯。如今地方政府是“两头热”，热心于农民工参保，利用政策杠杆，对不参保的企业进行处罚，以达到极力充大地方社保基金的目的。同时又热心于农民工退保。农民工退保，所缴保险费的“小头”（个人缴纳部分）由农民工一次性领回，“大头”（单位缴纳的统筹部分）仍在社保基金的账户里。深圳市如果按照最低工资800元来计算，企业每年为每个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应接近1000元，而深圳去年退保的人数达87万，即使每个退保的人都只交了一年的保险，也意味着一年里退保的人就把8亿多元贡献给了地方社保。退保只能退个人账户而不能退共济基金的现实，事实上助长了

地方追求当地利益。

无论怎样的制度设计，从政府的角度言之，都必须以保障农民工的利益为出发点，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思考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无论从制度上还是技术层面上都不难，只要降低农民工上缴的比例，增加退休后的退休金；建立统一的社保号，允许全国通用。可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何就解决不了呢？

[快报再评]

社会保障问题，无疑是继续发展的瓶颈。社保问题不解决，民众特别是农民工消费就有后顾之忧，所谓拉动内需就是一厢情愿，计划生育的障碍也难以排除。看来我国的社保体制应该有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管理、随劳动者本人走的记账制度迫在眉睫。不然，本来责任主要在政府的社保基金，反而成了地方政府从企业捞钱的借口，以致出现社保部门乐见退保的怪事。